

冲破墙纸之后呢

——吉尔曼《黄色墙纸》中的双重叙事进程

吴 涵, 王艳文

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 秦皇岛

收稿日期: 2023年5月23日; 录用日期: 2023年7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3年8月8日

摘 要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作家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写于1892年的短篇小说《黄色墙纸》是其最负盛名的作品, 被认为是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早期作品。这部半自传体短篇小说创作于吉尔曼深陷产后抑郁时期, 讲述了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子被内科医生丈夫约翰幽禁在一处殖民地住宅长达三个月的故事。无名女主人公遭受视觉冲击和嗅觉侵扰, 却用文字化的声音和非理性行为进行抗争, 最终实现从审美性向审丑性的转变以及灵魂和身体的融合, 为自己赢得生存空间和话语权。本文在双重叙事进程理论的框架下, 借助审美移情、气味书写、后殖民女性主义和解域化等理论拟探寻吉尔曼在短篇小说《黄色墙纸》中进行的视觉、嗅觉、听觉以及触觉的多重感官书写, 并尝试解答冲破墙纸之后无名女主人公的何去何从。

关键词

吉尔曼, 《黄色墙纸》, 双重叙事进程, 发声, 解辖域化

After Breaking through the Wallpaper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 in Gilman's "The Yellow Wallpaper"

Han Wu, Yanwen W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Received: May 23rd, 2023; accepted: Jul. 28th, 2023; published: Aug. 8th, 2023

Abstract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a famous American feminist writer, composed a short story "The Yellow Wallpaper" in 1892, which is her most well-known work and is considered to be an important early work of American feminist literature. This semi-autobiographical short story, written during

Gilman's deep postpartum depression, tells a story about a mentally ill woman who is confined to a colonial mansion by her physician husband John for three months. The unnamed heroine suffers visual shock and olfactory intrusion, but fights with literary voice and irrational behavior, and finally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esthetics to ugliness and the fusion of soul and body, winning a living space and the right of speaking. Under the framework of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 the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Gilman's visual, olfactory, auditory, tactile writing in "The Yellow Wallpaper" with the help of aesthetic empathy, scent writing, postcolonial feminism and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try to answer the whereabouts of the unknown narrator after breaking through the wallpaper.

Keywords

Gilman, "The Yellow Wallpaper",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 Speak, Deterritorializ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是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理论家。在第一段婚姻存续期间,童年不幸的吉尔曼并未在婚姻中得到补偿而是饱受抑郁症的折磨。第一任丈夫查尔斯·史德森(Charles Stetson)曾将她交予心理医生看管,“休息疗法”之下严格的饮食起居让吉尔曼游走在崩溃的边缘。受此启发,短篇小说《黄色墙纸》(1892)得以创作。起初,这部充满疯癫、迷狂色彩的短篇小说并未引起世人的重视,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再次进入大众视野,并成为女性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以无名女主人公的第一人称行文,既有日记独白的表征也有意识流小说的留痕。刚刚完成生产女主人公深陷产后抑郁、内心焦躁不安,作为内科医生的丈夫约翰在乡下租赁为期三个月的独幢别墅,希望妻子在乡下疗养身体。女主人公却发现了房间里黄色墙纸的秘密,其中的图案、颜色、气味让她愈加焦躁。她祈求约翰带他离开这里,但是约翰不为所动。女主人公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但对黄色墙纸的好奇心不断加重,竟然意外发现墙纸背后有一位爬行的女人。小说最终突兀式结尾,女主人公和墙后的女人一样在地上爬来爬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学界呈现出一股研究《黄色墙纸》的热潮,多从精神治疗和女性主义等方面入手,小说中出现的墙纸意象,男权压制甚至是鬼魂元素也都进行了广泛解读。Elaine R. Hedges在该作品的“后记”中评论道,象征病态社会系统的墙纸最终导致无名女主人公的迷狂,但在陷入疯狂的过程中,她在许多方面都比周围压迫她的人更理智[1]。Annette Kolodny认为《黄色墙纸》是坡写作风格的延续,即吉尔曼笔下无名女主人公对于困顿和自由的迷狂想象可以从坡作品中的异常感知和精神崩溃中找到根源[2]。Jean Kennard将无名女主人公的迷狂行为解释为一种更高形式的理智,这让女性主义批评家将此故事阐释为找寻身份之旅变得顺理成章[3]。Paula A. Treichler认为黄色墙纸是女性话语的隐喻,因此整个故事围绕女性与语言之间复杂关系展开[4]。Susan S. Lanser则认为《黄色墙纸》并非仅仅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提供文本沃土,美国白人学院派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正是由此确立其批评方式[5]。并且一众文章都将该短篇小说与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进行对比分析,坦芙尔·阿明·堂珂就曾聚焦于19世纪医疗行业的“一种偏执演变成极力根除同性恋的或畸变的肉体表现”[6],并借用《简爱》和《黄色墙纸》中的男女对立探究性别化权利协商。国内对于该部短篇小说的解读可大致分为如下

方向, 时间空间、权利话语、精神分析、不可靠叙述等, 但汉松教授剖析黄色墙纸作为“物”的视觉体验和审美共情, 切入角度独树一帜[7]。但以上剖析甚少涉及小说结尾无名女主人公迷狂之后会发生什么, 本文试图接过这一问题, 通过搭建双重叙事进程框架对该文本进行双重探索, 女主结尾处突如其来的迷狂行为是否在前文有所暗指, 而冲破墙纸之后叙述者又该何去何从?

“双重叙事进程”(或称“双重叙事运动”“双重叙事动力”)(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是由我国叙事学家申丹教授首创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模式。2021年申丹教授出版专著《双重叙事进程研究》, 以理论架构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重读一系列短篇小说, 例如肖邦的《一双丝袜》和曼斯菲尔德的《心理》等, 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申丹教授认为“批评传统的束缚是导致情节发展背后的隐性进程被忽略的根本原因。在情节发展的背后, 还存在一股叙事暗流。这股暗流既不是情节的一个分支, 也不是情节深处的一个暗层, 而是自成一体, 构成另一种叙事进程, 自始至终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这两种叙事运动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走向, 在主题意义、人物塑造和审美价值上均形成对照补充或对立颠覆的关系”[8]。本文在双重叙事进程理论的框架下, 借助审美移情、气味书写、后殖民女性主义和解域化等理论拟探寻吉尔曼在短篇小说《黄色墙纸》中进行的视觉、嗅觉、听觉以及触觉的多重感官书写, 并尝试解答冲破墙纸之后无名女主人公的何去何从。

2. 情节发展中视觉、嗅觉的双重压迫

吉尔曼采用“黄色墙纸”作为标题并非无心之举而是匠心独运, 在情节发展中, 黄色的墙纸为无名女主人公带来持续不断的、愈加强烈的感官刺激, 最终导致精神分裂, 其行为彻底迷狂化、疯癫化。在底色为黄的墙纸上, 各种匍匐蔓延、不规则分布的图案正在犯下艺术之罪。伴随着精神状况的不断恶化, 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甚至转化成轻微但挥之不去的嗅觉侵扰, 即“黄色的气味”。此外, 黄色“yellow”一词还有胆怯、懦夫等非正式语义, 同样暗指女主人公压迫之下的性格倾向。在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压迫下, 小说女主人公在妻子、母亲、作家三重身份中失去主体性, 逐渐真空化。

2.1. 审美移情作用下的视觉冲击

小说以无名女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展开, 吉尔曼意识流一般的笔触将无名女主人公所经受的视觉冲击展现得一览无余。首要的视觉冲击来自墙纸的图案, “那些蔓延曲折极尽浮华图案中的一个把艺术之罪都犯全了”[9] (p. 572)。这种图案乏味、令人迷惑, 但又吸引人去考究它。上下左右甚至呈对角线联结的线条横冲直撞、毫无美感, 为女主人带来视觉恐慌, 愈加烦躁不安、怨声载道。第二波视觉冲击紧跟而来, 那是一种“让人作呕、难以遏制的肮脏黄色, 且随着太阳光线的缓慢移动而逐渐褪色”[9] (p. 573)。图案和颜色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弱, 而是以一种无礼的方式没有尽头地“盯着”无名女主人公。黄色墙纸, 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物”, 自然是静止的、无生命的、不能发声的、没有情感色彩的, 为何在精神分裂的女主人公眼里, 黄色墙纸如此夸张、怪诞、对她产生邪恶的影响呢?

黄色图案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其实是女主人公审美移情作用下的产物, 是她因缺乏主体性而产生压抑心理的现实投射。德国著名心理学哲学家利普斯认为移情的对象不是一个物质实体, 而是一个“空间意向”[10] (p. 28)。即在审美心理学的认知中, 原本作为“物”的墙纸成为一个情感容纳器, 其中的情感容量随着移情主体的情绪位移而产生变化。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常人眼中固定不动的图案和形状却在精神分裂的女主人公眼里时时刻刻都在变化。身居高位的内科医生丈夫不相信她有心理疾病, 在亲戚面前只是描述成为暂时性轻微的心理焦虑。产后抑郁的女主人在这间年代久远、与世隔绝的房间里不与任何人来往, 负面情绪不断累积并且在丈夫爱的禁锢之下难以找到出口。她的所有情绪都投射到无生命的“物”上, 她的情绪赋予墙纸以生命。原本无生命的墙纸竟然长出了断裂的颈部和球状的眼睛, 墙纸“活”了。

墙纸更是如同有生命一样将无名女主人公扇倒在地, 任意践踏。而这一切都只是无名女主人公与黄色墙纸独有的秘密, 无关他人, 因为只有饱受他者压迫的她与墙纸产生审美移情。

无名女主人公审美移情作用下的视觉冲击并非完全被动接受, 而是留有主动选择的印痕。利普斯认为, “经验联想的方向是由己及物或由己及人的” [10] (p. 28)。如果说无名女主人公作为独立的个体, 将自己压抑的情感投射到无生命的黄色墙纸上, 那么作为一位年轻妈妈, 她又将自己对黄色墙纸的负面情绪带入到孩子的视觉体验中。她庆幸是自己承受了黄色墙纸带来的视觉冲击, 这对弱小无力的婴儿来说是一场幸运的逃离。无名女主人公对墙纸进行仔细观察后, 这种移情更进一步地注入对前房主家孩子们的宽宥中, 她理解原来屋子里的小朋友为何将黄色墙纸撕破, 换做是她也会有相同的举动。

2.2. “黄色味道”所带来的嗅觉侵扰

视觉冲击尚未平息, “黄色的味道”又成为拨弄无名女主人公敏感神经的一大利器。在文学世界中, 气味不仅仅具有生物学上的属性, 还与人物的身份地位、情绪意志、甚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变迁等多个方面紧密相连。汉斯·林迪斯巴赫(Hans J. Rindisbacher)曾指出, “嗅觉是现代性体验的核心, 它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审美化中发挥着越来越强大的作用, 并且决定性地塑造了现代和后现代的主体性” [11]。墙纸的味道一直在公共空间存在, 无名女主人公在进入这所房子的时候就感受到了。但是“黄色味道”并非一开始就出现, 而是经历了由视觉到嗅觉的转化过程。在无名女主人公开始对墙纸的秘密产生兴趣且不愿离去的时候, 她感受到了“黄色”的气味, 那是一种“非常轻微的、不慎察觉的, 挥之不去的怪味” [9] (p. 579)。气味当然没有颜色, 但叙述者却用“黄色”来形容墙纸味道, 可见, 黄色墙纸带来的视觉冲击并未解除, 而是在无名女主人公的感官系统内部产生了某种化学反应, 让她的嗅觉神经都沾染上“黄色”。女主人在公共空间的味道中灵敏地嗅出“黄色味道”, 属于私人审美领域的再创造。无名女主人公曾认真想过一把火烧掉房子, 彻底消除来自黄色墙纸的怪味, 但她最终适应了, 与“黄色味道”共存在一定程度上是叙述者主体性回归的表现。

幽禁在这样一间年代久远、阴森恐怖的居所里, 女主人公时时刻刻忍受着来自视觉神经和嗅觉神经的侵蚀, 精神衰弱加之病体孱弱, 她的多重身份变得模糊, 逐渐丧失主体性。作为一位母亲, 她无法亲自照料出世不久的孩子, 甚至不能陪伴在侧。作为一位妻子, 她无法成为丈夫的贤内助和温柔乡, 而是一个随时需要看管的负担。而婴儿的懂事和先生的体贴让她的内心充满愧疚、焦虑甚至抑郁。只有写作的时候, 她才成为她自己。身为作家, 女主人公虽然具有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编造故事的习惯, 但在创作性思维的大起大落间同样产生神经衰弱和精神错乱。1817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在致其弟弟乔治与托马斯·济慈(George and Thomas Keats)的书信中提到, 像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天尊拥有无穷无尽的“负面接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 即在充斥着不确定性、难解之谜, 甚至疑窦丛生的环境中能够不焦躁地追求事实和真理。显然, 情节发展中的无名叙述者对黄色墙纸的强烈抵触心理表明她并不具备济慈提出的负面接受力, 女主在写作这样最具主体性的个人活动中也无法独立存在着。毋庸讳言, 她在母亲、妻子和作家的多重身份中同样找不到自己的价值与位置。

3. 隐性进程中听觉、触觉的双重反抗

在双重叙事进程的理论框架内, 吉尔曼小说中的感官书写可继续延伸到听觉和触觉, 进而直指无名女主人公的大脑神经元。当外界给予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压迫时, 基于能量守恒的永恒真理, 这种力量又以同样的方式从听觉和触觉的双重感官书写中给予回击, “我”的声音被听到、被留存, “我”的身体被释放, 趋于自由、动态的稳定。需要注意的是, 来自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压迫与来自听觉和触觉的双重抵抗并不构成相互颠覆的关系, 而是交织缠绕在无名女主人公的意识形态里, 即“我”找寻主体、重建

身份是呈螺旋式上升的动态运动过程。

3.1. “我”的声音：由被忽略到被听见

在情节发展的叙事轨道上,从疗养地点、治疗期限到房间选择、家具摆设,“我”的声音一直被以丈夫约翰为首的他者所忽略。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三剑客之一的斯皮瓦克曾发出令人深省的一问“底层人能说话吗?”^[12]。在后殖民主义叙事的语境里,“底层人/属下”(The Subaltern)一词指涉与殖民统治者相对立存在的被殖民者群体。但“属下”的内涵并非局限于此,可进一步拓展为女性之于男性、孩童之于成人、下级之于上级甚至弱者之于强者等多种地位不平等的统治与抵抗关系。小说女主人公作为深陷抑郁的产后母亲同样是某种意义上的“属下”,她听命于丈夫、医生的严格饮食起居安排。女主人公曾经数次央求丈夫调换房间、重新装修房子或者直接带她离开这里,但均被丈夫用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拒绝。约翰用甜言蜜语将“我”的声音沉默化,最终无名女主角不再发声。

然而,在隐性进程的叙事轨道上,无名女主人公一直在以日记独白的方式将意识诉诸于文字,持续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况且,文字是一种比声音更加恒久、更易留存的发声方式。如前文所述,小说以第一人称行文,无名女主人公曾多次停笔留下段落间的空白。

约翰过来了,我必须停笔了,他讨厌我写字^[9] (p. 573)。

妹妹正坐在楼梯上^[9] (p. 573)。

每当约翰或者其他家庭成员到来时,女主被迫停笔,停止发声。尽管多次停笔,无名女主人公还在持续不断地记录“我”独自对黄色墙纸秘密的探寻、对图案颜色的喜恶变化,对约翰表面爱护实则控制的嘲讽、对弱小孩童的心灵守卫。无名女主人公在第三次停笔之后写下:“我不知道我竟然写下了这些”^[9] (p. 576)。吉尔曼用“should”(竟然)一词以强调无名女主人惊讶于自己的所思所想甚至所写之物。这种特殊的发声方式是无名女主人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但却是作家吉尔曼的巧妙创作。在文本之外,吉尔曼曾将这部短篇小说寄予推崇“休息疗法”(rest cure)的主治医师塞拉斯·威尔·米切尔博士(Dr. Silas Weir Mitchell),意在为产后抑郁的女性群体发声。

此外,女主通过狂欢化的肢体语言强迫他者倾听自己的声音。当约翰站在门口又嚷又叫的时候,无名女主人公爬行在地、拒不开门,并且用最平和的语气重复说道:“钥匙在前门车前草叶子底下!”^[9] (p. 582)。约翰不得不认真聆听无名女主人公给出的方位信息,找到钥匙得以开门。房间内的无名女主人公保持在地上爬行的姿态,只是抬头望着约翰,大声警告:“我最终还是出来了,你不能再把我放回去了”^[9] (p. 582)。而约翰的生理反应说明了一切,他晕倒了,他被无名女主人公长久压抑之下爆发出的强大声波所击倒,他终于听见了“我”的声音。

3.2. “我”的身体：由被禁锢到被释放

在情节发展中,“我”的身体被约翰以爱之名幽禁在看似恬静舒适实则阴森怪异的房子里,学界也普遍认为约翰的医学逻辑和父权话语强制无名女主人公放弃思考与创作的本能。但是在隐性进程中,女主人公独自完成辖域化、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完整过程,用迷狂行为为自己赢得了话语权与生存权。

女主人公在豪宅和墙纸所建构的双重辖域中惬意舒适在先,郁郁寡欢在后。辖域是指“界限明确的区域,身在其中会有安居于自身之所(at home)的感觉”^[13] (p. 88)。而汪明安教授却点明,“在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美学意义上,辖域化意味着某种等级制中心主义和静止的时空”^[14]。这两个看似相互抵牾的哲学概念却在无名女主人公的空间心理状态中完美共存。女主人公刚刚抵达这所殖民地豪宅的时候,评价道:“这是个极美的地方”^[9] (p. 572)。如同小说中描绘的英伦风景一般,甜美的花园、斑驳的树影、纵横的小径、爬满藤蔓的凉亭、窗外宁静的海湾和码头、乡下高大的榆树和天鹅绒般质地的草坪,任何

人都会认为这是个疗养的好去处。但是黄色墙纸毫无征兆地出现了, 更进一步说, 黄色墙纸所建构起来的三维空间禁锢住女主的身体和灵魂。怪异的图案、令人作呕的颜色甚至弥漫不散的黄色气味不断挑战着无名女主人公原本就敏感的神经。饱受身体和心理双重折磨的无名女主人公多次或主动或被动地躺着(lie down)。这种背靠大地、面朝穹顶的躯体位置是最接近圆寂的姿态, 换言之, 她躺着什么都不能做, 只有等待时间在她身上停止。后来, 她发现墙纸背后的一个女人在夜间爬行, 甚至许多女人在夜间爬行, “她们”在凉亭上、在花园里、在小路上四处爬行。作为不可靠叙述者, 无名女主人公的视觉对象究竟存在与否无从考证, 但这种怪诞的视觉书写更可能是作为精神分裂者生发出来的某种精神幻象。

随后, 叙述者也以一种小心的、不被人发现的姿势开始爬行, 这是一种典型的解辖域化过程。“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Deterritorialisation)是由 20 世纪法国哲学巨匠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精神病学家瓜塔里(Félix Guattari)提出的概念, 意指无器官身体“正在脱离辖域, 趋向大地的运动; 是打破壁垒, 超越边界从而趋向于无所羁绊之境的动态过程”[13] (p. 88)。毋庸讳言, 无名女主人公的最明显的疯癫表现就是“爬行”(crawl/creep), 她通过皮肤上的触点与大地直接接触。汪明安教授在谈及身体转向时曾说, “恰恰是这种动物性重新将人的怪异性行为夺回来, 并根植于人性本身”[15]。爬行(crawl)的英文释义是用手和膝盖作为支点, 身体贴地式前进, 而这种类似蛇的躯体运动代表了一种动物性的回归, 是去理性化的过程, 同样也是一种欲望能动性的回潮。从静止地躺着到动态地爬行, 这一身体姿态的翻转表明无名女主人公正在脱离他者为其设立的辖域, 逐渐趋向大地。

无名女主人公作为“生成-弱势者”(becoming-minoritarian)在小说结尾处完成“再辖域化”。约翰亲眼目睹妻子的迷狂行为后瞬间晕厥, 而女主淡然表示“看来我每次不得不从他的身上爬过去!”[9] (p. 582)。“每次”挑明无名女主人公冲破墙纸之后可以任意、自由地爬行, 她所爬经的地方已然形成新的辖域, 也就是“再辖域化”。墙纸已经不再是空间分割物, 也不再是分离灵魂与肉体的屏障, 而是无名女主人公可以跨越的无形障碍。如此, 无名女主人公作为他者眼中难以共情的弱势者, 独立完成辖域化、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完整过程, 进入可以任意移动的“平滑空间”。

4. 冲破墙纸之后的双向融合

黄色墙纸带来的种种谜团尚未揭底, 女主的行为又逐渐疯癫, 并在结尾处戛然而止, 以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结局留给读者反思前文与续写后文的空间。冲破墙纸之后, 无名女主人公又当如何? 她能否在妻子、母亲、作家三重身份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位置?

4.1. 审美与审丑的转化式融合

短短三个月的疗养周期对内科医生约翰来说是精神分裂患者的医学疗愈, 而对无名女主人公来说还是一段拓展审美边界、接纳负面美学的认知之旅, 黄色墙纸给予无名女主人公以审视丑陋事物的机会并与其共存的勇气。刚刚来到殖民地豪宅的无名女主人公对家居设计略懂一二, 她眼中的墙纸并未“遵从放射法则”, 而是“一种带着震颤性谵妄的‘拙劣罗马’风格”[9] (p. 575), 这表明她对殖民地时期墙纸的美学概念甚为不解。当审美危机与产后抑郁相结合, 她的视觉体验告知神经中枢, 这面墙纸是造成心理状态每况愈下的罪魁祸首。正如但汉松教授所言, “好的共情必须是一种在主体意志掌控下的个人思维训练, 而不能任由激情感的挟裹”[7] (p. 125)。随着“我”与墙纸的每日接触、彼此相伴, “我几乎可以想象辐射, 无穷无尽的怪诞似乎围绕一个共同的中心形成, 并以同样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向前猛冲”[9] (p. 576)。并且女主人公在还剩十天就归家时, 竟然对墙纸产生迷恋, 沉迷于墙纸的秘密不能自拔。墙纸固然不能改变原有的图案、颜色和味道, 除去光线、天气等外在因素, 无名女主人公审美体系的更迭才是造成墙纸变化的主要原因, 即她可以在神秘、复杂、令人不适的“物”中保持好奇、探寻秘密, 甚至找

到美的存在并与之共情。

这段开启认知新世界的“审丑”之旅亦可看作是无名女主人公作为作家的成长叙事。美与丑大开大合之间带来的巨大张力是艺术家进行创作的灵感来源。1818年, 济慈与密友 J.H. Reynolds 的多封书信往来中不断提及并深入阐释“负面接受力”, 这种概念是对既定哲学和先入为主的自然系统的拒绝, 诗人要接受而不是寻找事实或理由, 更不要寻求对每一个真理、神秘或怀疑的绝对知识。同在 1818 年, 济慈致他的审稿人理查德·伍德豪斯(Richard Woodhouse)的信中同样谈及“负面接受力”, 他说诗人是一切存在物中最没有诗意的, 因为诗人没有自己的身份, 总是在寻找或填充另一个身体。同为文字创作人, 同样面临身份危机, 无名女主人公在这段“审丑”之旅中不断获得“负面接受力”, 逐渐学会在绝对的美与绝对的丑之间找到合适的含混地带, 狂欢地生存。审美维度上的含混与文学创作上的含混存在相当程度的共通性, 身为作家的无名女主人公也能够狂欢地书写。

4.2. 灵魂与肉体的矛盾性融合

墙纸内外的女人互为身体和灵魂, “我推她摇, 我摇她推”, 她们合力把这面将欲望和躯体分割开来的黄色墙纸撕裂开来。正如吉尔伯特和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所分析的那样, “爬过墙纸和躲藏在墙纸背后的形象, 其实既是叙述者, 又是叙述者的替身” [16]。那句“我终于出来了”是灵魂与肉体所发出的响亮共鸣。墙纸如同围城, 里面的人想出去, 外面的人想进来。小说中无名女主人公灵魂与肉体的矛盾性融合印证了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女性的空间想象观, 她们一方面向往无拘无束的空旷场域, 另一方面又将自己封锁在铜墙铁壁的狭小空间中。想来, 这部著于 1892 年的短篇小说还是免不了打上时代风尚的烙印。突兀的“绳索”意象是连接灵魂与肉体的抽象存在。墙内的女人准备一根绳索, 打算将从墙外进来的女人绑住, 但最终为获取安定感却将自己牢牢绑住。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 尼采曾论断: “人是联结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悬在深渊上的绳索” [17]。无名女主人公在尼采的哲学世界中用绳索连接起自己的身体和灵魂, 一方面以回归动物性的迷狂行为认清灵魂所需, 另一方面以肉欲合二为一的方式探寻逃离人生深渊的有效路径。

灵魂与身体合二为一带来的重量足以让无名女主人公从身份真空化中得以脱离, 进而趋近大地、生成新的可能性。米兰·昆德拉曾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赋予“轻与重”以辩证关系, “当负担完全缺失, 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 就会飘起来, 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 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 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18]。生命中的负担是必要且有意义的, 这种负担可能来自创伤、危机、自然灾害、他者压迫甚至自我想象。“黄色墙纸”带给无名女主人公以精神创伤和审美危机, 而恰恰是这种精神负担让她原本比空气还轻的生命得以落地。人类从不期盼任何精神负担的到来, 更不感谢任何精神负担的创痕, 但却从中获取在坦途中得不到的经验与教训。当生命有所负担, 寄予希望将其解除, 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就愈加明显, 身份认同也就愈加强烈, 无名女主人公也就能在生命的各种角色中游刃有余。

5. 结语

吉尔曼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灵感来源, 创造出这部半自传性质的女性主义经典之作。无名女主人公在情节发展中遭受视觉、嗅觉双重压制, 致使其作为妻子、母亲和作家的三重身份真空化。而在隐性进程中无名女主人公用文字化的声音和非理性行为进行双重反抗, 发出自己的声音, 完成辖域化、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完整过程, 重新赢得自己的话语权利和生存空间。两条叙事轨道并非互相颠覆或承前启后, 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谱写了一曲生成弱势者抵抗他者压迫和自我封闭的狂欢之歌。女主人公在短短的三个月内, 经历从审美性到审丑性的转化式融合, 完成灵魂和肉体的矛盾性融合, 承担生命

中不可或缺的“负担之重”，进而趋向大地，生成新的流变与可能。正所谓不破不立，无名女主人公的精神起伏和实践路径指向现代社会中每一位进退维谷的个体，有时候人生的无解之局恰恰需要这种非常态、非理性、狂欢化的行为来破解。冲破墙纸之后，她已来去自由，日臻化境。

致 谢

非常感谢得到河北省 2019 年度省级研究生示范课项目“英美诗歌”(KCJSX2019029)的支持。

基金项目

本文系河北省 2019 年度省级研究生示范课项目“英美诗歌”(KCJSX2019029)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 [1] Hedges, E. (1973) Afterword. In: Golden, C., Ed., *The Captive Imagination: A Casebook on the Yellow Wallpaper*, Feminist Press, New York, 49-53.
- [2] Kolodny, A. (1980) A Map for Rereading: Or, Gender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Texts. *New Literary History*, 11, 451-467. <https://doi.org/10.2307/468938>
- [3] Kennard, J.E. (1981) Convention Coverage or How to Read Your Own Life. *New Literary History*, 13, 69-88. <https://doi.org/10.2307/468643>
- [4] Treichler, P.A. (1984) Escaping the Sentence: Diagnosis and Discourse in “The Yellow Wallpaper”.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3, 61-77. <https://doi.org/10.2307/463825>
- [5] Lanser, S.S. (1989) Feminist Criticism, “The Yellow Wallpaper,” and the Politics of Color in America. *Feminist Studies*, 15, 415-441. <https://doi.org/10.2307/3177938>
- [6] 坦芙尔·阿明·堂珂. 疾病与欲望:《简·爱》与“黄色墙纸”中对隐秘的同性恋的惩戒(英文)[J]. 外国文学研究, 2009, 31(1): 40-49.
- [7] 但汉松. 作为物的“墙纸”——论《黄色墙纸》中的“世纪末”视觉经验和审美共情[J]. 外国文学, 2019(6): 115-126.
- [8] 申丹. 双重叙事进程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54.
- [9] Gilman, C.P. (2019) The Yellow Wallpaper. In: Mays, K.J., Ed., *The Norto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13th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571-582.
- [10] 牟春. 现象学视野下的移情问题[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复旦大学, 2008: 28.
- [11] Rindisbacher, H.J. (1992) The Smell of Books: A Cultural-Historical Study of Olfactory Perception in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https://doi.org/10.3998/mpub.23363>
- [12] 斯皮瓦克. 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M]. 陈永国, 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13] 周雪松. 西方文论关键词解辖域化[J]. 外国文学, 2018(6): 81-93.
- [14] 汪明安. 文化研究关键词[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 [15] 汪明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16] 桑德拉·吉尔伯特, 苏珊·古巴. 阁楼上的疯女人: 女性作家与 19 世纪文学想象[M]. 杨莉馨,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17] 弗里德里希·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 钱春绮, 译.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0.
- [18] 米兰·昆德拉.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 许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